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 世纪 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 吴健敏

20 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开始全面走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教育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化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

胡适曾说,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邦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像杜威这样大。北京大学教授吴俊升在《增订杜威教授年谱》中说,中国教育所受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予国外教育影响之巨大,也以中国为第一国。但是,在建国后教育领域内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流毒的运动中,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诸如《杜威批判引论》、《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批判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等著作,以铺天盖地的气势对给中国教育改革带来过积极影响的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界在拨乱反正中对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

而如何认识和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在这方面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从传入途径看,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杜威自己亲临中国言传身教。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的 1919 年 5 月 1 日,杜威来到中国,进行了长达两年两个月的讲学和旅游。杜威以世界一流教育家的身份在身居要职的中国弟子们的簇拥下,到过上海、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东北三省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举行了数百场学术演讲,竭力宣传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对在“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下正向中国传统思想发起猛烈冲击而热衷于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说当时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杜威热”似乎也不为过,以下事实就是明证: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的杜威在华演

讲集《杜威五大演讲》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短期内即破记录地再版10次;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如《学校与社会》、《经验与教育》、《民本主义与教育》、《我的教育信条》、《德育原理》、《儿童与教材》等等都被迅速地翻译出版,其中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还被作为师范院校教育学的教科书得到广泛使用;杜威教育理论中的著名命题,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极为流行的语言;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教育刊物《新教育》、《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大量刊载杜威教育论文的汉译文。^①

第二,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厚学术渊源并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调研。与杜威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以继承和发展杜威的教育思想为己任的孟禄、克伯屈,曾于1921年和1927年分别应“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和“中国教育改进社”的邀请来中国讲学调研。在华期间,这两位教育专家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推崇不仅对当时中国教育界方兴未艾的“杜威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理论指导直接参与了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

第三,杜威的中国弟子将杜威的教育思想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是由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回国留学生掀起的。尤其是“庚款留学潮”中赴美攻读教育专业的留学生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推动更是功不可没。在中国教育开始全面改革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教育部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几乎都由留学归国人员担任,其中从杜威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回国人员不在少数。如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胡适曾任北大教务长、校长和中国公学校长,陈鹤琴曾任北高师校长,郭秉文曾任南高师校长,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陶行知曾任南高师教育系主任……真可谓不胜枚举。当然,还有更多得杜威教育思想之真传名不见经传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默默无闻地工作在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线。这些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极为深厚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实力派人物,在理论探索和教育实践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了或隐或显的“杜威印记”,从中自然也就不难看出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之所在。

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学制改革上。

杜威来华的1919年,正是中国教育界讨论学制改革最为热烈的时候。这一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将学制改革作为会议的首要议题。会议就各省

提出的几个不同的学制改革预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因分歧太大没有出台新学制,但在学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达成了共识,即“教育之真义”要“以儿童为本位”,“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②这为新学制具体内容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指导思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了杜威的相关教育理论。所谓“以儿童为本位”就是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即反对以任何外在的目的把儿童塑造成某一定型的人格,主张一切从儿童出发,充分发挥儿童的个性。所谓“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也就是对杜威“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学说”的概括。两年后,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上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1922年9月,教育部专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讨论修改了这个草案。最后,教育部根据全国学制会议的决议案审定了“学制系统草案”,并于1922年1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新学制”。这个“新学制”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壬戌学制”。从这个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发展进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壬戌学制”的具体内容看,它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全面贯彻了“新教育之真义”,而且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从新学制所制定的新教育的七项标准中可明显看出来。(一)适应社会进步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③从20世纪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趋势看,可以说“壬戌学制”奠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格局。这个新学制为中国结束旧式教育提供了制度保证,从而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迈上现代化的轨道。

其实,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新学制的酝酿讨论过程中就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杜威教育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孟禄博士,在杜威结束访华不久的1921年9月又专程来华,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到北京、保定、太原、开封、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南通、福州、厦门、广州、济南、曲阜、天津、奉天等地,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考察,并在所到之处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而且,经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了感性认识之后,孟禄博士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新学制的讨论和修订。孟禄在中国期间,正逢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主要任务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孟禄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对新学制的确定起到很大作用的专题演讲。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对此作了很好的记载:“此次会

议其间,恰逢孟禄博士来粤,对于会议进行,贡献甚多。计开演讲会一次,谈话会三次,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解。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④

杜威的教育理论还对中国教育界的教材、课程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旧式教育的教材受“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教育方针所限,严重脱离学生的实际和现实生活实际,几乎以“千年不变”的方式让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们在充满学究气的陈旧教材中接受着“千年不变”的教育。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主要观点,随着中国教育界“杜威热”的掀起而得到广为传播并被广泛接受,这自然使人们对远离生活实际和儿童实际的旧式教材产生不满。而且,不以新式教材取代旧式教材,也就无法贯彻“新学制”,尤其难以贯彻“新教育之真义”。于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纷纷着手改革教材。在杜威“儿童中心说”的影响下,以“研究并编译儿童用书改造全国小学教育为宗旨”的“儿童用书研究会”应运而生。儿童用书研究会“以促进儿童用书之革新”为己任,组织编写、翻译、出版了大量儿童教科书及儿童课外读物。这些新的儿童用书一扫旧式教材的酸腐学究气,密切联系生活实际,以儿歌、童话、民谣、寓言等新鲜活泼的体裁为主,文章内容多以描写儿童常见的猫、狗等动物和常见的植物为主,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兴趣爱好和自然天性。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从做中学”等著名的观点使教材改革更加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各科新式教材,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应用性的内容。如1923年出版的当时在全国发行的《初级国语读本》,就将“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列为其“选材要旨”。^⑤在如今的教材改革热潮中,重温20世纪初对中国的教材改革有过切实帮助的杜威教育理论,应该说仍然不无启发。比如,要解决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中“积累”起来的现行教科书严重偏离学生兴趣等积弊,重提杜威的“学生兴趣主义”和“教育即生活”等观点,还是相当适时的。

从课程改革方面看,杜威的“活动课程论”思想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活动课程论”主张让学生根据自己身心发展的不同特点,灵活掌握学习的进度,不同的学校可根据师资、设备和地方需要开设不同的学科,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和适应地方的实际需要。20世纪20年代的课程

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成果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与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相配合,则要求开设大量选修课。这项改革举措显然深受杜威“活动课程论”教育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到师资不足等条件的制约,这项课程改革举措在当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从此后中国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看,开设一定量的活动课程,一直是20世纪中国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

综上所述,杜威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学制改革、教材改革、课程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作为对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家,杜威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而且,从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其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亦毋庸讳言。比如,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学说,在克服脱离社会现实和不顾儿童身心发育的教育弊端方面,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但就人接受教育的实际途径看,除了通过直接经验接受教育外,通过间接经验接受系统的知识教育,才是更主要的,系统的知识传授也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陶行知当年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以杜威教育即生活学说为指针,在晓庄师范学校中附设乡村中心小学、乡村中心幼稚园、民众夜校、晓庄剧团、乡村救火会、中心菜园、乡村医院等等,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这种小而全的办学模式,在重社会实践的同时忽视了知识的系统传授,办学效果并不理想。当然,本文有限的篇幅不可能全面地阐述和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注释:

①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上、中、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3期;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生平 and 著作年表》、《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评新学制草案》,《教育杂志》第11卷号外《学制课程研究专号》。

④《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纪略》,《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⑤《初级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3年版。

吴健敏,浙江温州医学院助理研究员